



西北师大社科文库

明代内阁政治研究

田 澍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明代内阁政治研究

田 澍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邵永忠

封面设计：胡欣欣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内阁政治研究 / 田澍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2

ISBN 978 - 7 - 01 - 017841 - 7

I. ①明… II. ①田… III. ①内阁制—研究—中国—明代 IV. ①D69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1357 号

明代内阁政治研究

MINGDAI NEIGE ZHENGZHI YAN JIU

田澍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25

字数：30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7841 - 7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前 言

西北师范大学是甘肃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同建设的重点大学、国家重点支持的西部地区十四所大学之一，也是甘肃省人民政府统筹推进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工程重点支持的高校。学校有着悠久的办学历史和深厚的人文底蕴，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荟萃了一批著名学者，如教育学家李蒸、李建勋、李秉德、南国农等，中国语言文学专家赵荫棠、徐褐夫、尤炳圻、郭晋稀、彭铎等，历史学家黄文弼、顾颉刚、阎文儒、金宝祥、金少英等，心理学家胡国钰、章仲子、郭士豪、沈庆华等，法学家萨师炯、吴文瀚等，外国语言文学专家李庭芴、黄席群、刘维周等，著名艺术家吕斯百、常书鸿、洪毅然、黄胄等，著名体育教育理论家袁敦礼、董守义、徐英超等，都曾在西北师范大学任教讲学，辛勤耕耘，为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厚植西部人文传统，传承华夏历史文脉，把人文社科研究的真学问、大文章写在了祖国西北的大地上，也激励时贤后学秉承他们高尚的人格精神，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践行“知术欲圆，行旨须直”的校训。

甘肃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同时又是“丝绸之路”的黄金通道和重要节点。作为甘肃历史悠久的大学之一，西北师范大学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决定了其哲学社会发展定位与目标的独特性，那就是根植西北，立足传统，站在学科前沿，围绕国家文化发展战略需要，大力提高理论研究水平和实践创新能力，进一步发挥西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高地、人才培养重镇、政策咨询决策智库的重大作用，培育一批特色鲜明、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哲学社会科学学科。

《西北师范大学人文社科文库》的编辑与出版，就是希望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中，以西北师大声音，展西部文化气派！这既是对西北师大百

年人文传统的承继与发扬，也是对学校新时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

作为实施一流学科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等国家与省域文化战略的重要举措和标志性成果，本文库的编辑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立足基础性与前沿性。选题围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的需要，侧重学科基础研究，引领学术前沿探索。

二是彰显地域性与民族性。选题突出甘肃与西北地区的地域特色，突出多民族融合的民族特色。我们希望通过这套文库的出版，不仅要让世界知道“丝绸之路上的中国西部”，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西部”“理论中的中国西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西部”。

三是秉持创新性与时代性。文库涵盖人文社科多个学术领域与研究方向，不拘泥体例的统一，但均以时代为底色、创新为基准，或能“揭示一条规律”，或能“提出一种学说”，或能“阐明一个道理”，或能“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在创新过程中，致力国际视野和本土智慧水乳交融，追求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紧密结合。

明道尚德，推崇新声；崇尚学术，追求卓越！我们希望本文库能够真正发挥“名片”效应和“引领”作用，在集中展示西北师范大学人文社科研究整体水平的同时，引领助推学校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迈向新台阶、产出新成果、形成新影响。

《西北师范大学人文社科文库》编纂委员会
2017年9月10日

自序

中国古代历史进程是发展的，还是停滞的，学界曾有过激烈争论，特别是停滞论曾盛极一时。由于中国文化自身所具有的内聚力和包容性，中国历史具有“超稳定结构”是客观存在的，连绵不断的中国历史就集中反映着这一独特现象。但连续的历史并不是停滞的历史！事实上，中国历史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至于变化的快与慢，则取决于各个时期内部与外部的诸多因素。树欲静而风不止，形势的变化要求人们必须因时而变，顺势而为，不断革故鼎新，而不能故步自封，守株待兔，拒绝因势而为，否则将被时代所淘汰，被革命所埋葬。如何理性地看待不断变化着的中国历史，学术界的认知能力还不是很高，其中对明代历史特别是明代内阁问题的认识也是如此。

就中国古代政治而言，明代内阁的产生是一个全新的现象，与朱元璋称帝后的政治生态密切相关。学界在表述中国历史上的改革类型时，一般只讲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某一王朝内部的变革，而很少关注改朝换代时期的革新。事实上，当一个王朝无力突破旧体制的束缚而进行自我超越、自我否定之时，只能在各方利益的羁绊中苦苦挣扎而坐以待毙，由新兴力量取而代之并推动社会变革，解决旧势力难以解决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从继承的关系审视改朝换代的历史现象，诸如“汉承秦制”“唐承隋制”“明承元制”“清承明制”等等。其实，从革新的视角来看，则是汉改秦制、唐改隋制、明改元制、清改明制，诸朝在继承中根据时代的要求从事着显著的革新，推动着历史的进步，书写着各自的政治个性。换言之，继承与革新是统一体，继承中有革新，革新中有继承。没有静态的继承，也没有依样画葫芦的继承；而革新也不是随意地另起炉灶，更不是天马行空。就元明之际的历史嬗变而言，朱元璋作为反元起家的开国皇

帝，对元朝的弊政有着深刻的体认和独特的见解，而绝不会也不能照猫画虎，简单地照搬元制而统治新生的明王朝。纵观朱元璋的思想和行为，他不仅对元制非常不满，而且对秦汉以来的有关制度也多有批评，他要在历史惯性中按照自己的认识和所能达到的目的来尽可能地变革国家治理模式，防范各类势力侵害新兴的大明王朝，确保江山永固，万世长存。

在朱元璋全面的变革当中，他优先考虑的就是要极力避免秦汉以来不断出现的宰相专权、宦官弄权、外戚窃权等种种害政现象，试图全力消除危害政治安全的不稳定因素，通过权力制衡来加强中央集权，使明王朝在安全的政治环境中得以稳定运行。他推行的一系列深度改革为明朝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影响巨大。但很多论著将朱元璋解决危害国家权力正常运行的系列改革简单地看成是朱元璋极力强化个人的权力，并将其视为历史上权力最大的皇帝，一再发掘其负面效果，而极少有人从变革的角度认识其稳定国家安全的强大作用和深远意义。

在明初重大变革之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废除一千多年来的丞相制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改革历程中的重大事件之一，影响深远。要认识这一问题，不仅要从小明所处的时代来看，而且更要从小明之后的历史演变来观察。只有将其置于大的历史时段来认识，才能真正理解此举的历史作用及其深刻意义。朱元璋废相绝不是简单的皇帝个人集权的问题，而是用分权——制衡之术来确保中央集权的有效运行。纵观有明一代政治的演变和走向，朱元璋废相只是政治变革的开始，至于废相以后的权力中枢如何运行，将是一个逐渐探索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也就是说，由朱元璋开启的明代政治体制的变革将是一个长期而又艰难的探索过程，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不可能一蹴而就。

在废相之后，朱元璋很想尽快解决中枢决策疲软的问题，但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替代制度。其子朱棣即位后，在朱元璋改制的基础上创立了全新的内阁制度，正式确定了废相之后中枢机构的新名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明代的中枢运行机制仍然处于探索状态，朱棣也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建立起完备的内阁制度。终明之世，内阁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极难定型。所以说，内阁制度的不断探索和完善，既是明代内阁的最大特点，又是明代政治的最大特点。究而言之，从废相到设置内阁再到阁权的演

变，核心的问题是赋予内阁多大权力。而内阁在废相之后形成的全新的政治生态中想要获得较大的权力，将是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可以说，终明之世，内阁的地位和权力问题也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正由于此，明朝灭亡最核心的原因就在于后张居正时代阁权的迅速疲软，无法形成一个强力内阁，其国运便随着内阁的功能弱化而走向衰微。

所以，要真正认识明朝政治的特点，必须首先要认识明代内阁的运行特点。这是当初笔者进入明史研究领域时的第一感觉。自1986年攻读明清史硕士研究生以来，时光已过30年，笔者的这一感觉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愈加强烈。当初选择硕士学位论文选题时，笔者毫不犹豫地以明代内阁作为研究的重点。最后以《明代内阁新论》通过论文答辩。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一题目明显过大，属于大题小做，难以深入。但正是通过这一题目的撰写，使笔者在硕士阶段对明代内阁及明代政治制度框架有了宏观的认识和总体的把握，并对中国历史上的相权及中枢运行特点有了较为系统的思考，为此后进行比较微观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以内阁为切入点或以内阁因素来认识明史，使笔者找到了开启明史研究的一把钥匙，成为笔者认知明史的关键路径。

正是有了对明代内阁的宏观把握，在接下来对张居正的研究就有了自信。通过研读《张太岳集》、《万历起居注》、《万历邸抄》、《明实录》、《明史》、笔记小说、地方志等文献，在不断的学习和思考中对张居正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不再轻易地迷信前人所言，自然也就不再人云亦云，走向独立研究的道路，逐渐形成一家之言，对明史有了不同于他人的解读模式。根据笔者的研究体会，要真正研究张居正，首先必须全面了解和真正认识内阁制度，否则就不可能理性地、多角度地认清张居正，也不可能理性地看清其对明代政治正面和负面的多方影响，更不可能总结出深刻的历史教训。后来，在作大礼仪与“嘉靖革新”的博士学位论文时，又离不开内阁问题。涉及的杨廷和、张璁、夏言、严嵩、徐阶、高拱等关键性人物，都是内阁首辅，对明代政治皆有重要影响。而认真、深入研究张居正之前的嘉靖朝历史，又扩大了认知张居正的视野，彻底改变了观察张居正的角度，对其看法也就与众不同。不难看出，笔者的治学轨迹从宏观的内阁制度研究转向阁臣及其相关事件的微观研究。只有在微观研究的基础

上,才有可能反过来对明代内阁做出相对客观的整体认知。目前,由于明史研究的整体水平不高,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还不很深入,故对明代内阁研究仍处于不断探索的阶段。可以说,没有微观研究的基础,就不可能在宏观层面上对明代内阁做出符合实际的总体评论。这是长期以来明代内阁研究中存在的瓶颈,也是明代内阁研究难以深入的主要原因。

正是由于明代内阁始终处于动态之中,所以明代的政治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也正是由于阁权的不稳定性,才要求阁臣特别是首辅在较大的行政空间内把握好分寸,找准位置。阁臣特别是首辅过分懦弱必然导致“纸糊”,而一味张扬必然导致“专擅”,这两种极端行为都不是阁臣恰当的行为。在内阁研究中,如何将明代内阁制度的“形”与阁权运行的“神”较好地结合起来,即如何认识阁权行使中的“度”,是笔者时时力图把握的一个方向,也是笔者竭力体现的一条主线。

众所周知,黄宗羲对明代政治评价不高,其在《明夷待访录》中就断言:“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此言被广泛引用,成为对明代两百多年历史持悲观论者的主要依据之一。但认真思之,黄氏之论并不符合实情,过于武断。一来在明代之前各朝丞相称谓五花八门,且运行机制各不相同,并无定制,本身就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二来也不是有了丞相就有善治,汉、唐、宋、元的历史就是明证;三来明代能够稳定地延续将近三百年,其国家治理能力明显远超前代,社会持久稳定,威胁国家安全诸势力被有效控制,对此不应视而不见,更不能简单否定;四是明代内阁的职能始终处在变化之中,有时的权力与作用绝不亚于此前的相权,相当一部分学者还将内阁视为相权在明代的翻版。黄氏的亡国之恨和由此带来的激愤可以理解,但不顾历史传统和文化惯性而想当然地否认明代的治理水平和成效,则是偏颇的。明亡之后,时间已过370多年,学界对明代政治的总体认知水平和解读能力还是很有限的,观点各异,争论不休。其中对内阁职能、地位、作用、性质等问题的认识分歧极大,难以取得共识。所以,对以内阁为核心的明代政治运行机制与特点的研究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探索的关键问题,也是提高明史研究水平的客观要求。

为了把笔者近30年来对明代内阁的研究做一阶段性总结,特选择一部分研究成果整理、修订出版,以便同人能够较好地了解笔者多年来对该问

题的持续思考和不断探索。特别是通过大礼议与嘉隆万政局走向的集中研究，旨在说明没有对相关核心问题的精细探索，依据似是而非的模糊认识，试图对明代内阁乃至明代政治做出相对理性的宏观描述是不可能的。本书的出版，旨在抛砖引玉，提供批评的靶子。因为没有理性批评和自我纠正的自言自语是不可能推动学术进步的，同样，不认真全面汲取学术研究成果的自言自语也是无益于学术进步的。

田 澍

2016年11月8日于西北师大

目 录

上编 明代内阁总论

一、一九八〇年以来明代政治中枢模式研究述评	2
二、明代殿阁大学士与阁臣关系考辨	16
三、明代阁臣人数考辨	21
四、明代内阁的基本特点	29
五、明代内阁的政治功能及其转化	35
六、大礼议与杨廷和阁权的畸变	44
七、张璁与嘉靖内阁	53
八、首辅张居正的困局	65

中编 内阁与大礼议

一、杨廷和与武宗绝嗣危机	78
二、杨廷和与大礼议	88
三、明代大礼议中的革新思想	98
四、张璁与大礼议	109
五、大礼议的断裂与重塑功能	122
六、大礼议与嘉靖政治新秩序的形成	134

下编 内阁与嘉隆万政局的走向

一、正德十六年明廷政局的走向	144
二、正德、嘉靖之际政局的走向	154
三、嘉靖、隆庆之际政局的走向	163
四、嘉隆万政治变革的走向	171
五、嘉隆万时期的吏弊与政局演变	180
六、皇权视域下的张璁与张居正	202
七、革新应变与明朝立国久远	219
【附录一】	226
一、吴晗和他的朱元璋传记	226
二、科举的利弊及清朝废除科举的教训	237
三、严明以驭吏 宽裕以待民——朱元璋的为政之道	248
四、武定祸乱 文致太平——刘基的人生经历与历史功绩	251
五、文韬武略 七下西洋——郑和的航海功绩与历史地位	254
六、经邦安国与思想创新——王守仁的政治与学术贡献	258
七、行为国栋 德足世仪——海瑞政治行为特点	261
八、机遇与制度的碰撞——张居正的施政特点	264
九、瘟疫肆虐与明朝政府的应对措施	267
【附录二】明代皇帝简表	272
【参考文献】	274

上 编 明代内阁总论

内阁是明代政治变革的产物，也是中国古代中枢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明代内阁的争论，主要围绕着其与皇帝和六部等职能部门的关系而展开。就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多数学者倾向朱元璋个人皇权的强化，将明初政治制度的一系列变革简单地看成是朱元璋个人意志的体现。这种认识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朱元璋称帝后的历史既有继承的一面，又有变革的一面。不论继承还是变革，都不可能是皇帝个人意志的简单选择。朱元璋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废除丞相制度，就在于一千多年来该体制的弊端太多，难以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当中国历史发展到明代，对此必须予以反思和应对，不能再延续下去了。所以说，废相符合历史的潮流，亦符合当时政治的需要。朱元璋能够顺利地废除这一传统体制，说明是顺势而为，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需要指出的是，废相不是简单地将相权收回皇帝所有，而是要进行制度创新。而人们所谓的皇权绝不是简单地指皇帝个人的权力，而是一种权力体制。对皇帝个人来说，并不是权力越多越好，而是要在整个权力体系中掌握核心权力。这主要取决于皇帝个人的身体和精力状况。而要掌握核心权力，就必须通过分权—制衡之术来实现。所以，废相就是要实现分权—制衡的政治目的，以确保政治的稳定。废相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但要建立起完备的分权—制衡体系，可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从朱元璋时期的殿阁大学士到朱棣时期的内阁，就是不断探索建立新的中枢模式的一个艰难过程。而在朱棣之后，内阁也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难以定型。但总的原则是受制于皇帝，没有相对独立的行政权，与废相的初衷相一致。

毋庸置疑，阁权是明代皇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明代皇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所谓阁权与皇权的矛盾绝不是两个相互独立

的权力体系的矛盾，终明之世，阁权始终受制于皇权，不可能独自挑战皇权。作为上下级的关系，双方有矛盾是十分正常的现象，无须大惊小怪。在这一矛盾中，阁臣在新的皇权体系中始终处于下风，不可能战胜皇帝。对于不同时期不同阁臣与皇帝关系的亲疏远近，便成为人们认识阁臣有权还是无权或权大还是权小的依据，仁智所见，分歧由此而生。

一、一九八〇年以来明代政治中枢模式研究述评

自1980年以来，大陆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潮，明代高度强化的君主专制制度自然成为研究的热点。许多学者投入大量的精力，对其予以多方面的剖析。在这一研究当中，学者们大都涉及明代政治中枢运作模式问题，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翻检各类论著，尽管学界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仍然是见仁见智，争论不断，歧议仍存。

（一）朱元璋废相与明代政治中枢的新模式

朱元璋是大陆学界研究的热点人物之一。1980年以来，学者就朱元璋与明代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皇权到了朱元璋时代能够迅速强化呢？陈梧桐认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制的普遍发展以及封建社会走向衰落、地主阶级益趋腐朽所引起的社会矛盾的激化”是促使朱元璋强化中央集权的两个根本原因，朱元璋通过“改革国家机构”“制订《大明律》”“强化对人民的统治和镇压”、“加强对官吏的控制和对豪强地主的打击”以及“大力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等措施，大大地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使他的皇权空前提高^①。朱诚如则以“皇权的绝对专制”来描述朱元璋的权力，认为废中书、罢丞相、废除大都督府和分封藩王监军，使行政权和军权集于皇帝一

^① 陈梧桐：《论朱元璋强化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统治》，《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

人，并通过酷刑、滥杀等形式树立皇帝的绝对威望，是朱元璋专制统治的主要表现形式^①。在这一研究中，学者们用力最多的是朱元璋通过废除传统相权扩张皇权的问题。李天佑认为：“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借口丞相胡惟庸‘谋逆’，杀胡惟庸等，废中书省，罢丞相不设，由六部分理全国政务。六部都直接听命于皇帝，所谓‘事分六部，权归人主’，从而大大加强了君主专制。朱元璋以皇帝兼行宰相职权，成为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君主。宰相制的废除，从制度上扫除了君主专制的任何障碍，这是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史上的一大变革，它为皇帝不受任何牵制地行使其无限权力扫清了道路。”^②王鸿江提醒在研究朱元璋的皇权问题时，要区分其在位的前十年和后二十年的变化，认为朱元璋强化皇权的原因既不是其面临军事贵族叛变的危险和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也不是朱元璋猜忌好杀的本性使然，而应该从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思想中去寻求答案。指出：“封建社会进入晚期，社会各种矛盾日趋尖锐复杂。统治者为维护没落的封建制度，就要加强对社会各方面的控制，强化皇权就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而一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的历史也为强化皇权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在这样的历史前提下，就出现了明初皇权强化的现象。朱元璋采取许多前所未有的集权措施，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使明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高度强化的封建专制时期。朱元璋强化皇权专制的迅速与剧烈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③谭天星认为朱元璋的废相之举“决不是什么偶发因素的产物，而是朱元璋深思熟虑的结果”^④。肖立军在承认“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不断增强的趋势为明初宰相制改革提供了可能性基础”的前提下，认为“朱元璋的独断猜忌和事求万全的性格又使废相成为现实”。^⑤

废相之后，相权流向何处，学界的看法有较大差异。一部分学者认为相权全部流向皇帝，使废相后的明代皇帝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双重角色。王其渠认为朱元璋废相后“由皇帝直接处理政务，从中央到地方的

① 朱诚如：《论明代洪武年间的封建专制统治》，《辽宁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

② 李天佑：《再论明清的封建专制》，《东岳论丛》1981年第2期。

③ 王鸿江：《论明初皇权专制的加强》，《南开学报》1981年第1期。

④ 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第4页。

⑤ 肖立军：《朱元璋杀胡惟庸废相考辨》，《天津师大学报》2000年第6期。

军事、行政、监察等大权，全部由皇帝独揽，一人专决，实际上是由皇帝自己兼任了丞相的职权”^①。关文发等人也认为废相后“皇帝事实上兼任了丞相的职责，从而使君权与相权合而为一，形成了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②。但有些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相权并未全部流向皇帝。王天有认为：明代史料对宰相称谓运用十分混乱，在不同场合和时代将六部尚书、内阁、司礼监太监称为宰相，这种混乱状况正好说明明朝宰相权力被分解的事实。进而认为洪武时期相权分别流向皇帝和六部，仁宣以后则流向司礼监、内阁和六部^③。谭天星也认为废相后相权并没有被皇帝所囊括，其中一部分流向皇帝，另一部分则流向六部，并认为六部地位的上升和部院的分立，不仅没有削弱皇权，反而与朱元璋强化君权相一致^④。

但有的学者并不同意以上两种观点，认为朱元璋不可能真正废除相权。周积明认为：“明代内阁的职权固然与历代宰相的职权相去较远，但却决不是相权质的变化。相权的存在，是封建地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必要手段。”^⑤姜德成认为朱元璋不可能废除相权，认为洪武时期“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已完全发展成熟，国家宛如一架庞大机器，即使有时运转不良，而断然拆除任何部件，便会造成更大故障”。所以在废相之后必须要有一个在皇帝最高裁决权和部院执行之间类似于宰相机构的存在^⑥。刘晓东也认为朱元璋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废除传统的宰相制度。因为传统的相权本身处于动态的发展过程之中，而废相之举并不在于“将全部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而在于它既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皇权，又保证了国家机制的正常灵活运转”。进而认为“对于皇权来说由于无法缺少相权的辅弼，因而不可能在实际上将相权予以废除。唯一可行的方法只有对宰相权力与地位的合法性予以一定程度的剥夺，使其由合法转化为非法存在，以达到弱化相权的目的”。^⑦

① 王其渠：《明代内阁制度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页。

② 关文发、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第8—9页。

③ 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1—52页。

④ 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第4—5页。

⑤ 周积明：《嘉靖—万历初统治系统的自体调节》，《江汉论坛》1986年第4期。

⑥ 姜德成：《明代内阁制浅议》，《兰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⑦ 刘晓东：《明代丞相制度新论》，《明史研究》（第七辑），黄山书社2001年版。

尽管学界对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后相权流向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同时一部分学者又对朱元璋能否真正废除宰相权力表示了明确否定，但绝大多数论著认为朱元璋废相之举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一件大事，明代政治体制因此而发生了巨变，明代皇权的进一步强化乃至高度膨胀是毋庸置疑的。正因为如此，废相对明代政治中枢产生了巨大影响。曾惟一认为：“朱元璋废相之后，在皇帝与府、部、院之间必然出现一个权力真空，因为众多军国大事必须有一个机构协助皇帝加以处理。但是由什么机构、什么人来填补这个权力真空，在整个明代，却由于有废相定制的祖制而一直未能很好解决，因而造成明代统治上层争夺补填这个权力真空的斗争十分激烈，所谓内阁纷争正是其突出的表现。这是朱元璋废相定制所带来的后患之一。”^①

（二）明代内阁在政治中枢中的作用与地位

多数学者认为，废相使朱元璋的皇权得到了空前的强化，但这种强化的直接表现就是皇帝政务负担的急剧加重和日益繁忙。为了应付这一局面，朱元璋曾起早贪黑、夜以继日地勤于政务。但这种行为在短时期内尚可坚持，长此以往，则难以为继。也就是说，在废相之后，出于减轻皇帝政务负担的客观需要，朱元璋及其子孙还必须在行政过程中不断探索新的辅政制度，以弥补皇帝个人施政的不足，确保皇权的正常运行。洪武十三年（1380）九月至十五（1382）年七月，朱元璋所设立的四辅官就是这一实际需要的尝试。在废除四辅官之后，朱元璋又于洪武十五年（1382）十一月设置了殿阁大学士，让翰林官员充任。王其渠认为殿阁大学士的主要职责是要做好皇帝的参谋，“要他们献计献策，出主意，经皇帝裁决后，再交五府、六部等衙门去执行。”^② 谭天星进一步指出，殿阁大学士作为皇帝的顾问，其涉及的内容除学术方面外，还包括政事方面，“咨询的范围和机要性程度是由皇帝本人所掌握的，因为此时还没有给大学士以预机要

^① 曾惟一：《朱元璋的集权与明中后期的政治腐败》，《四川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

^② 王其渠：《明代内阁制度史》，第11页。